张恨水与现代杂志：从张恨水轶文两篇谈起

朱周斌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的“张恨水全集”62卷收录张恨水作品众多，但仍有许多工作值得继续去做。随着新文学期刊研究的推进，许多现代文学报纸和杂志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关注，一些资料的获取也日益变得可能。在此过程中，对于张恨水作品的重新发现，也有了更多机会。笔者偶尔找到两篇未收入“全集”的张恨水作品，一为《同事少年多不贱》，是为《北洋画报》六周年应其主编吴秋尘之邀而作，一为《所望于旅行杂志》，亦是应《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而作。二文皆非纯粹散文作品，但其中却非常直观地包含了“张恨水与现代杂志的关系”这一命题，为我们理解其中的一些事实和基础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镜面。

一、新闻报纸与现代杂志对于张恨水小说的意义

张恨水与新闻报纸及现代杂志的关系，是张恨水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面，也是目前张恨水研究中特别成熟的一个领域。没有新闻报纸及现代杂志，很难想象，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恨水。根据今人统计，“张恨水可查可考的 104 部中长篇小说的首发，是由42 家媒体完成的，其中报纸为 33 家，杂志为 4 家，出版社 5 家。其中由报纸首发的占 78.5%；从首发作品的具体数量来看，出版社 16 部，杂志社10 部，报纸 78 部，报纸首发的小说占其全部小说的 75%……”[1]可见，张恨水的写作是多么深地依赖于现代报刊杂志。这意味着张恨水并不简单地就是编辑记者作为自己的生存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张恨水的写作的基本阵地乃至于基本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就是以新闻报纸及现代杂志为基本的依托。打一个比方，当时的报纸就相当于今天的网络。尽管现代新闻报纸及现代杂志与如今的网络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类比仍然是可以成立的。报纸杂志与网络一样，首先是一种传播媒介的新形式，但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而且更是广大作者（各种博主、大V）和广大读者（大众粉丝）之间交往、互动（虽然强度不一样）空间，它们的出现与发展，代表了新的文化形式乃至于社会思潮与力量的兴起。这种“新”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化所代表的趋势，在此之前和在此过程之中，多种不同的道路及其代表人物，都在通过报纸和杂志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他们也各自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进而成为报纸和杂志本身的招牌。

从下面将要探讨的《北洋画报》六周年所写的《同事少年多不贱》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报纸的副刊，为张恨水这样的文人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而他们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们以此为起点，走上了各自的人生小舞台和大历史的画卷；另一篇他为《旅行杂志》所写的《所望于旅行杂志》谈到了他对于《旅行杂志》的期待，但实际上，借助于对于张恨水相关小说文本的分析，我将证明，这本杂志对于张恨水的意义远远超过他自身的认识。可以说，两篇文章很能同张恨水关于创作的一些文章以及他的一些小说文本，形成相互印证和说明。

二、从《世界日报》出发：《北洋画报》中的张恨水轶文考

从现存资料来看，张恨水并没有在《北洋画报》中发表过重要的小说。但从这篇轶文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北洋画报》的时任主编吴秋尘和张恨水有过一段非常珍贵的共事经历：“民十四年，北平世界日报出版，予任明珠版编辑。因自知力不胜任，乃觅文人帮忙，而私拟有数条件：一须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趣味，三勤苦耐劳，至文字佳，脑筋清楚，又其本分也。于是费一日之力，得于通信中，罗致四人，其一为君，其三则张友彝，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三兄也。合作凡数月，甚相得，明珠版竟轰动一时。”甚至这五个人被称为“明珠党”。

这里的“明珠版”，指的就是《世界晚报》的“日报版”（也即《世界日报》）之副刊。《世界晚报》的老板成舍我，是张恨水早期到北京工作时重要的合作者，张恨水开始是在成舍我当编辑的《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后来成舍我创办了《世界晚报》，张恨水作为新闻编辑，却因有过创作小说经验，被成舍我邀请在此报副刊《夜光》上连载小说，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春明外史》。这部小说为张恨水带来了广大的读者群，也为他以后制作“章回体”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从而也客观上促使张恨水被目为“鸳鸯蝴蝶派”的继承人。而在报纸内部，也促使成舍我在继续创办《世界晚报》的“日报版”时，让张恨水来编辑它的副刊《明珠》。时在1925年。一个“晚报”却最终创办“日报版”，可见当时报业发展态势之迅猛，而《世界日报》无疑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世界日报》日销量达三万五千多份，居当时北京各报之首。” 张恨水虽然没有如愿地进入大学继续读书，但却从这样大的报纸中迈开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自觉地做了一次人生方向和文学方向的抉择。

在“五四”之后，“副刊”越来越变为各个不同立场和思想推出自己见解的阵地。张恨水所属的“副刊”风格无疑是倾向于通俗化的市民和普通文人的口味。《明珠》的出版，对于张恨水来说开启了一种疯狂的写作模式。就在这个时候，他继续写作《春明外史》的第二集，以及在《益世报》上写作长篇《京尘幻影录》，而在《明珠》自己的园地上，他则写作了《新斩鬼传》。而且同样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恨水“一度任日报总编辑”。[2] 这就是张恨水招聘人员、形成“明珠党”的现实背景。“自知力不胜任”云云，背后却是报纸的日益扩张；而对遴选人员的标准和要求，则特别突出“学生”和“文笔”，显示出该报紧跟当时社会潮流、创造和保持高水平的文化品位的定位，也显示出张恨水个人的趣味与立场。

实际上，虽然张恨水和成舍我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是对方非常重要的人，但是，他们之间后来的相处可能有些不太愉快。这种不愉快张恨水在事后的描述中轻描淡写，但从这篇轶文来看，应该早有端倪，“明珠党”迅速成为一个招牌，但奇怪的是，“旋报社以减薪裁员”，《世界日报》社老板并没有长远的打算，也不像张恨水那样爱惜人才。但对张恨水来说，这段共事的经历却是他特别看重甚至是引以为傲的。他一直保持着对这些昔日同事的关注，并在数年后的1933年对他们的现状如数家珍：

吴君他就，虚白亦入他报，凡鸟则南入复旦大学，惟友彝共事较长；然吾五人，则对新闻文艺事业，继续努力如旧。友人中乃混号吾五人为明珠党，恨水虽忝陪末座，固引以为荣也。至于今日，友彝而作官而留学日本，现为世界日报编社论，并在燕大任讲师。虚白在南京驻京记者中，为最红角色，月入五六百金。凡鸟为左翼作家，以戏剧名文艺界。秋尘在平津文艺界正负盛誉，出其余力，以编北画，于画报中，称雄华北。

令今天的我们都惊异的是，包括张恨水自己在内的“明珠党”五人，不仅仅是在1933年各自继续引领一时风潮，实际上，他们后来在文化史不同领域内均能占有一席之地，这可见张恨水“识人”的眼光。对于他来说，严格地依据了自己所设定的选人标准：“于是费一日之力，得于通信中，罗致四人”。在繁忙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中，他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对文字的敏感，挑选出了四个真正的人才，这是“明珠党”得以迅速形成的原因，这也预示了张恨水一生能达到如许成就的必然性的某种根基之所在。

以马彦祥（马凡鸟）先生为例，根据他的儿子马思猛先生回忆，在1923年，他不过刚刚在“北京二中读三年级”的年纪，迷上了看戏，甚至不惜为此同自己的父亲、北大教授、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决裂，离开家庭，“开始为《维纳斯》杂志做校对，后又为上海《时报》撰写‘北京通讯’”，而晚上又继续看戏。[3]可惜，马思猛先生没有提及马彦祥先生在《世界日报》短暂的经历，如果他知道张恨水先生当年像他的父亲一样，早就给上海的报纸撰写“北京通讯”一类的文字，那么他可能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同张恨水先生的同事经历，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是多么重要。而张恨水仅凭“通讯”，就将这样一个不过是初中毕业生的人才从众多的应聘者中遴选出来，不禁令人感叹他的眼光和胆识。后来，马彦祥先生继续热爱戏剧，考上复旦，跟随洪深先生学习戏剧，并在1938年（后于张恨水写作此文）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抗战期间又在重庆出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与爱国热情，建国后还担任过中央文化部艺术局长等职。所有这些，都是1933年的张恨水先生所无法预知的，这使得他当初的选择和此刻的回忆都显得愈加珍贵。

张友彝先生，也即张友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法学家，也是一名政治学家。在张恨水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仍在《世界日报》工作。张友渔先生的社论显然已经产生了较为广泛影响，他也有一个从国民党左派进而成为共产党员的过程，期间还被迫流亡日本一段时间，而成舍我又想在政治上利用张友渔先生的左派身份，仍然请他回来编社论，这便是张恨水先生这段话的由来：“至于今日，友彝而作官而留学日本，现为世界日报编社论，并在燕大任讲师。”可能是鉴于两人在1933年写作此文时仍是同事之故，也因政治不宜说得太多之故，张恨水在此文中对张友渔先生着墨最少。约50年后，张友渔在晚年则多次提及他与《世界日报》之间的往事，可与张恨水此文相互印证：

一九二五年二月，成舍我把世界晚报扩大成两个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报屁股”上登了条招考特约撰稿人的广告。投考的人不用去报馆考试，只要把自己写的稿件寄几篇去，请报馆审阅。和我同时被录用的有四人，其余三人是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我们这几个特约撰稿人每月工资也是十五元。我一个月有三十块钱的工资收入，除了上学、吃饭、穿衣，还可以买些书籍了。比我初到北平的几年，每月只花几块钱的生活是大大改善了！世界日报文艺版《明珠》和世界晚报文艺版《夜光》的主编都是张恨水。我把稿子寄给张恨水，由他决定用于世界日报的《明珠》，还是世界晚报的《夜光》。这是我和世界日报开始接触的情况。[4]

这段文字与张恨水的《同事少年多不贱》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所牵涉到的世界日报的扩张、招考方式、薪金问题，都基本可以相互证明。唯一的不同在于张恨水所称招考四人中的“吴秋尘”，在张友渔的回忆中则为“胡春冰”。这个问题并非无关紧要，由于张友渔先生的声望，他的说法很容易被采用，故此，“张恨水全集”中的“张恨水年谱”中，采纳的基本就是源自张友渔先生的说法：“应考人颇多，由张恨水主考，最后录取了张友渔、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四人。每月每人发稿费十五元。”在该条下，注明这一说法来源于“1980年《新闻研究资料》第4期《张友渔同志早期的新闻生活》。[5]这种说法同张恨水早在1933年的回忆出入很大，孰是孰非，貌似可大可小，但深究起来，背后涉及的却不仅仅是史实，而且可能与后来长期生活经历带来的信息过滤机制也即人生立场有关。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这四人中，第三人为朱贻荪（虚白），看起来确定无疑。但实际上，这仍然是有问题的。按照左笑鸿的回忆，朱虚白却是后来的。左笑鸿指出当时之所以招聘特约撰稿人，是因为当时两个副刊每月要二十四万字，但可支出的稿费却只有四十元，于是张恨水想通过特约撰稿人的方式，集中支出稿费：

不久，恨水想出了主意，把那区区的稿费集中使用，招请特约撰述四人，每人每月十元，要供给一万字以上，爱写什么写什么。招请的结果，约定的是，张友彝、马彦祥、胡春冰、吴秋尘。这四位当时都是大学生，都写得一手好文章。恨水把他们的稿件全部用在《明珠》上，这一下就给了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胡春冰后来到南方去了，就补上了朱虚白，又是一个“写将”。[6]

左笑鸿在当时也是《世界日报》，主要做采访部主任。他的回忆时间和张友渔的回忆时间差不多，但细节表达得更为清楚，这一细节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张友渔先生的记忆里会有张恨水先生的叙述里所没有的“胡春冰”，这就是因为胡春冰在《世界日报》的时间可能最为短暂，而其后到来的吴秋尘却因仍在北京之旁的天津而仍有往来，这就导致了记忆和叙述的偏差。

其实，更重要的是，可能张恨水当时将“胡春冰”从记忆和叙述中排除出去，与胡春冰当时的行为有关。胡春冰“到南方去了”，是因为胡春冰参加了左翼联盟，但似乎他参加左翼联盟时有过被捕经历，引起了他的同志们的一些猜疑。[7]这个时期正是张恨水写作这篇《同事少年多不贱》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张恨水是否了解胡春冰的具体经历，而从胡春冰后来的人生看，他还当过《中央日报》总编辑，也是当时新闻界重要人物无疑。也许张恨水写作此文时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政治考量，仅仅是从他的角度看，胡春冰与《世界日报》和他个人的关系并不深厚罢了的缘故。在这里，我们无法也不能做更多的探讨了。

如果说，马彦祥、张友渔甚至胡春冰均有较为明显的左翼色彩的话，那么，朱虚白和吴秋尘则与这二位有着明显不同的人生道路。朱虚白在张恨水写作《同事少年多不贱》的前后，应当刚刚离开《世界日报》不久，1934年，他还成了《朝报》的总编辑 ——而张恨水也曾担任过着一职位——朱虚白还与成舍我创办过《立报》。显然在《世界日报》的经历成为他重要的人生积累。他后来从政，担任过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处长。[8]渡台后，又成为一位新闻史学家，写作过《中国报业史》。

《同事少年多不贱》的主角，当属吴秋尘。写作此文的缘由，看起来是源于一种颇为反讽的情境：张恨水向吴秋尘抱怨文债甚多，而吴秋尘却因此为由头向他约稿。这其实是一个温暖的场景，洋溢着友谊与真情。张恨水还是答应了这一始料不及的约稿。这既是一次友谊的回顾，也是向世人交代一段励志的故事：几个学生（多数此时还没有能够上大学），却留下了一个传奇版的副刊，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一副刊迈向了各自浩瀚的人生旅程。也许吴秋尘最终的结局并没有像前面几位那样辉煌，甚至凄凉，[9]但他确实也很快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世界日报》之后，他主编了《东方时报》的副刊、著名的《东方朔》，旋又任职于《商报》之副刊。在他和张恨水再次相遇的1933年，他已继刘云若为《北洋画报》的主编。尽管《北洋画报》在印刷上不及《良友画报》，也不刊登政治新闻，似乎名声并不太响，但它当时确实集中了天津许多摄影家所摄照片。[10]近年来，关于《天津画报》的研究已经不少了，它与通俗小说的关系、与现代女性身体、广告审美的关系都得到了广泛的探究。吴秋尘虽然只是它的五任主编之一，但他作为张恨水在《世界日报》时的同人，也仍然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位置，不应被忽视。

从这些风格迥异、人生道路截然不同的人身上，也折射出了促使他们短暂相交在一起的那个人——张恨水——本人的品行与魅力之所在。这正是他基本的人生态度所致。他仅仅从来信中决定录取一个人，表明了一种只看文字的中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与精神。正是这种原则与精神，合理地解释了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如何相聚在一起然后又各自分离。正是这种原则与精神，保证了报纸，尤其是副刊，这样一种职业中，能够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保证了这一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集中地涌现和推出属于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而这也正是现代报纸和刊物在那个历史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之所在。

《世界日报》的副刊就这样成为他们走上人生和历史道路的出发站，对于张恨水和其他四位，如果算上胡春冰那就是其他五位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开始。

三、张恨水小说与《旅行杂志》的互文性：轶文《所望于旅行杂志》解析

《所望于旅行杂志》也是应《旅行杂志》主编之邀而作。这一行为本身表明了张恨水与该杂志关系的密切性。张恨水与《旅行杂志》发生联系，早在1930年前后就开始了。那是被他称为“忙的苦恼”、被他自己的母亲称为“成了文字机器”的时期，他当时在同时给不同报刊或杂志社写差不多至少五篇小说，于是，“而朋友们的特约，还是接踵不断，又把《黄金时代》，改名为《似水流年》，让《旅行杂志》转载。”[11]以往关于《旅行杂志》对于张恨水的特殊性重视得不够，这篇轶文《所望于旅行杂志》，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这一点。

表面上看，对于张恨水来说，《旅行杂志》不过是一份有一点点特殊的杂志：“愚读旅行杂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邮到，即置百事于不顾，忽忽展读一遍，以当卧游。”在张恨水的生活中，《旅行杂志》起着非常重要的娱乐休闲功能——虽然他的小说是别人的娱乐休闲，但对他自己来说，那却是沉重的工作负担，而《旅行杂志》把他重新变为一个纯粹的读者。但同时，“作者”的身份和意识又让他情不自禁地带上了一种探究的意识：该如何写一篇“旅行之文”呢？对此，他提出了一种逻辑推理及其基础上的个人见解：“盖山川胜景，古人已先我言之，山犹是山，水犹是水，虽以各游历家各个眼光之不同，分别申其意以成文，然后人言之者，究无以大异于前人。若人情风俗，则古人游历之文，向所不取。即徐霞客洋洋巨著，亦仅以简练之文，记山谷形势而止。使能将其足迹所经，闻见所得，尽付篇章，则有助于后人经济文章者，宁可估计？故今人作游记之文，正可于泉石之外，另有所取材。”在他看来，重要的不仅仅是自然的风光，更重要的是“人情风俗”，这是一种朴素的“写实”观和“社会关怀”观。但这也不过是他的主观想象而已。实际的情况是，不但是他试图去改造“旅行之文”，而是在他做出这样的改造的同时甚至是之前，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旅行杂志》自身的性质与定位所改造了。这就使得他的有关小说与《旅行杂志》形成了有意思的互文性关系。

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张恨水连载于《旅行杂志》的小说大致有：《似水流年》：连载于1931年五卷一期至1932年六卷十二期上海《旅行》杂志；《秘密谷》：连载于1933年1月七卷一期至1934年12月八卷十二期上海《旅行》杂志；《平沪通车》：连载于1935年1月1日九卷一号至12月1日十二号上海《旅行》杂志。《如此江山》：连载于1936年1月1日上海《旅行》杂志第十卷第一号至1937年3月1日第十一卷第三号；《蜀道难》：连载于上海《旅行杂志》1939年4月1日十二卷四号至9月1日十二卷九号；《丹凤街》：（原名《负贩列传》）：连载于1940年1月1日至1942年3月1日上海《旅行》杂志第十四卷一号至第十六卷第八号；《一路福星》：连载于1947年上海《旅行杂志》。

从这些小说的题目和内容来看，大概只有《似水流年》和《丹凤街》的主题离“旅游”稍远。其他的，如《秘密谷》是以张恨水故乡潜山一个想象之境为依托，讲述一个由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带队去探险旅游的故事；《平沪通车》是写在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一个富商被陌生女子所吸引、却最终不过是被骗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提请以后可能去旅行的读者，旅途充满风险、要注意陷阱的故事；《如此江山》写一男两女之间的三角爱情纠葛，背景也是在旅途上，在庐山；《蜀道难》写的是一个女子随他人坐船从武汉入川的故事，也是旅途上的故事；《一路福星》与《蜀道难》中所叙述的方向相反，写抗战后一群人挤车回战前的故乡去的故事。其实，《丹凤街》虽然不是直接与旅游有关，但它写作的时间是在1939年，正是全民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因此，在一本《旅行杂志》上来描写普通中国民众如何生活并如何走上战场的故事，也是再合适不过的故事，是《旅行杂志》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特定而恰当的立场与行为的表现。

必须指出，《旅行杂志》本质上是当时的“中国旅行社”的业务一部分。中国旅行社于1923年即已为上海银行所草创，到了1927至1928年间独立为“旅行社”，在1930年前后，中国旅行社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旅行杂志》便是中国旅行社众多与“旅游”有关的出版物中的一种，也是于1927年创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以精美著称，并且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销路不断扩张。从1929年起，从季刊改为月刊，“体例与从前略有不同，文字与图画讲求时效性。后来又屡次发布投稿简章，声明国内外游记、小说等凡是旅行范围内的，不论是创作还是翻译，是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受欢迎的对象。文章报酬较高，每千字酬现金二元至十元，艺术照片或图画每幅酬现金五角至十元，而且每篇或每幅都可以酌酬上海银行礼券或《旅行杂志》。”[12]这保证了《旅行杂志》在读者和作者群体中的品质与信誉，形成了良好的编、读、写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其中，作者的水平是杂志水平的根本保证，因此，当时《旅行杂志》吸引了一些知名学者和教授参与进来。

如前所示，张恨水现存最早的在《旅行杂志》上连载的小说，是《似水流年》。而且据他自己所说，这本小说最初还是名为《黄金时代》，似为其他刊物先载。这时正在1930年前后，也是《旅行杂志》正处于急剧发展的上升时期，也是张恨水在北方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的时期，又因《啼笑因缘》刚刚在上海《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连载，他开始成为全国畅销的作家。因此，将一本名为《黄金时代》的作品重新换成《似水流年》的名目在一本畅销的《旅行杂志》上连载，是对张恨水“畅销作家”身份的承认与借重，而对于张恨水来说，从此在一家以推介旅游为目的的杂志上连载小说并保持一种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不但意味着他被普通的市民阶层所广泛承认，更重要的是，这种读者阅读小说的目的和趣味具有非常明确的趋同性与一致性，这促使他提供给这家杂志的小说一般地要符合它的要求，将故事设置成适合于“旅游”这一群体的阶层趣味，甚至有的时候能够推动他们对于“旅游”的热情与渴望。非常能够说明双方的“合作”情况的，恰恰就是这部《似水流年》的结尾。小说写乡下青年黄惜时因为在城市里迷失了自己，当他返回家乡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脸面去见自己的老父亲黄守义和当初的恋人白行素，因为自己让家庭在家乡丧失了尊严，于是他在到达家乡的时候转身离去：

走上大堤，继续向前走去，这一道大堤卫护着皖河，通到扬子江岸，一望无际；直接青霭，那东起的红日，迎面而来，正把这河上的秋水秋烟，照得似有似无。这大堤的前面，晴光照着尘雾，也朦胧一片，在苍莽的前途中，一个孤独的旅客在那里走着；那人的情感，应当如何？而况他正不知是向哪里走的人啦！自这时候起，黄惜时的故乡，已经不再发现这个人的踪影，也再没有这个人的消息，许多人说他出洋了，也有人说，他旅行到云南贵州去了；不过在旅行杂志上，常常有一个署名“浪子”的人，发表旅行日记；日记上，总是记着他一个人的事。他有时在大江以南，有时又在黄河以北，成了一个无一定标准的旅行家。有人向旅行杂志社打听他的下落，编辑人说：“两三年以来，这人是不断的投稿，并无真实姓名。所有的稿费，他托我按月寄到安徽怀宁一个镇市上黄守义老先生收，社里只有照办，不知其他。”大家听说，便猜着这一定就是黄惜时；然而为什么不肯露真实姓名，就不得而知了。[13]

这也许不仅仅是张恨水的小说中，而且也许是现代以来的汉语小说中最易但也最应不被忽视的一段文字。首先，它巧妙地将景物的描写同人的心理感受结合在一起，是真正将文言文的基本技法融合到白话小说中的成功典范，但这也正是张恨水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法宝，是他将这种融合真正变得自然而然，真正提升了汉语表达的能力与水平。其次，这段文字带有传统小说对于故事完整性的固定接受心理，同时又具备电影镜头的飘忽感和画外音的现代叙事色彩，展现出基于对现代电影语言的把握，张恨水已经具备利用现代叙述技巧来改造传统章回小说的强大能力。再次，这段文字包含了跨越小说与非小说界限的技巧，将小说得像非小说，或者说，以非小说的感觉来：小说在结尾之处突然突破小说整体结构与框架，而是借用一份杂志刊载主人公的旅行日记形式，改变了小说的叙述方向并天衣无缝地回应了小说的主体，达到了以非小说的形式完成小说的效果。最后，与上一点紧密相连的是，小说中的“旅行杂志”既可以是泛指的某一种“旅行杂志”，也可以是特指此刻正在刊登这一篇小说的《旅行杂志》，因而很好地实现了小说文本本身与它的载体之间的结合，这是小说艺术与商业杂志之间完美结合的典范，它让这部小说的读者、杂志的编者与资方，以及小说作者之间，达成一种默契的“三方会谈”，实现了小说作者与刊物之间的双赢，也更为有效地促成了阅读这部小说购买这本杂志的读者合卷的刹那的阅读满足感。这是一种商业的迎合，也是一次巧妙的艺术对于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自觉定位。因此可以说，张恨水与《旅行杂志》之间的关系，要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要深入得多。

从张恨水自身的主观意图来说，这篇《所望于旅行杂志》中表现出，他不过是试图去改造或者说为《旅行杂志》带来新的风貌与气息。在这篇“期望”中，除了提出了一般性的原则，他还进一步举例说明该如何实践这种操作：“如游四川兼叙其物产之富，游广西写其建设之速，游甘肃白其人民之苦，既可避免沉浮，而亦有益于社会国家。旅行杂志，不尽为供给游历家之读物，似可自兹以后，略略偏重于此。”张恨水正是站在一个现代人对于现代生活的体验来写作这类“旅游”主题的小说的，不仅仅是在小说叙述过程之中会涉及到别处城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情社会现状，但是，如前所述，张恨水既创造性地展现了小说对于“旅行”的定义，同时，更为深刻的是，他“旅游”主题的小说，常常将旅游的动机同城市生活的紧张联系在一起。如《如此江山》开头：

五月尾的天气，已经把黄梅时节，闷了过去。但是太阳出来了，满地晒得像火烧一样，江南一带的城市人民，都开始走入了火炉的命运。据扬子江一带的人民传说，有几个大城镇，却是著名的火炉。第一是汉口，第二是重庆，第三是南昌。到了最近几年，因为南京改作了首都，猛可的添了几十万人口，这城里户口，拥挤起来，到了夏季，也成为火炉的第四位。[14]

“四大火炉”之类的说法至今依然在民间盛行，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竟然早在数十年前即已出现于张恨水小说中，并且，他不简单地将城市的闷热归结为自然条件所致，而是指出这是城市人口增加的缘故，他已隐隐约约地将“旅游”的目的为对城市生活的弊端的逃避。这样的描写在张恨水其他小说中也可以见到。可以说，张恨水与《旅行杂志》的关系要远比他自己所设想的丰富和深刻得多。他的小说文本与《旅行杂志》这份杂志的属性与定位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深入的互文性关系。在一个“旅行”尚不够普及的时代，通过这份杂志，张恨水为那个阶层提供了许多关于“旅行”的故事与风光描写，更揭示了那个阶层需要“旅行”的深层原因，而那些深层的原因要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才真正地大规模地浮出历史的地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确定张恨水作品谱系赋予他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形象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张恨水值得一读再读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张恨水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

注 释：

[1] 刘少文：《论报人生活对张恨水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3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3]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4] 马思猛：《我的父亲马彦祥与洪深》，《档案春秋》，2008年第11期。

[5]张友渔：《我与世界日报》，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年第1期。另外，在《报人生涯三十年》中，张友渔还有一条类似的记载：“《世界晚报》是1924年4月1日才创办的，第四版是文艺版《夜光》，主编是张恨水。我的杂文登在《夜光》上，每篇稿酬也是五、六角。《世界日报》登了一条为文艺版招考特约撰稿人的广告。不少人应考。我被录用了。每月工资也是15元。我每月有了好几十块钱的收入,上大学的生活不成问题了。”见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

[6] 《张恨水年谱》，载《写作生涯回忆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7]左笑鸿：《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副刊》，《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8] 旅冈（卢豫冬）：《我与左翼剧联广州分盟的联系》，《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9] 张林岚：《报坛巨擎称林放》，《新闻战线》，1992年第4期。

[10] 张济顺：《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

[11] 关于吴秋尘晚年的凄凉，约略见于安岗：《办报，一路不停地办报》，《中国报业》，2012年第15期。

[12] 俞志厚：《一九二七年至抗战前天津新闻界概况》，《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13]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14] 易伟新：《民国旅游业回眸：中国旅行社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第143页。

[15] 张恨水：《似水流年》，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07—408页。

[16] 张恨水：《如此江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页。

附录 张恨水轶文两篇

同事少年多不贱

载《北洋画报》，21年（1933年）七月七日，星期四，第801、802两期合刊（署名：张恨水）

来津得晤老友吴秋尘兄，畅谈为快，言及文字苦工，无片刻暇，则又相对愀然。予告秋尘：负钱债不足痛苦，惟负文字债一屁股带两胯，殊不知何日有清爽之时。君微笑肯首，似文债之台，亦巍然高筑也。旋笑语：君来适好，北洋画报，即届六周纪念，应有一文纪念，不必多，二百字即足，否则书数字亦佳。盖鉴于某之方哭文穷也，虽然，以吾人交谊，且适逢其会，果书数字而了之乎？若然，则予之哭穷，殆有预知之明，而用以搪塞老友矣？是乌乎可？无已，则为北画寿，并为老友寿，请以秋尘与某相识之始，以告读者，籍以知少年之应努力也。

民十四年，北平世界日报出版，予任明珠版编辑。因自知力不胜任，乃觅文人帮忙，而私拟有数条件：一须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趣味，三勤苦耐劳，至文字佳，脑筋清楚，又其本分也。于是费一日之力，得于通信中，罗致四人，其一为君，其三则张友彝，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三兄也。合作凡数月，甚相得，明珠版竟轰动一时。旋报社以减薪裁员，吴君他就，虚白亦入他报，凡鸟则南入复旦大学，惟友彝共事较长；然吾五人，则对新闻文艺事业，继续努力如旧。友人中乃混号吾五人为明珠党，恨水虽忝陪末座，固引以为荣也。至于今日，友彝而作官而留学日本，现为世界日报编社论，并在燕大任讲师。虚白在南京驻京记者中，为最红角色，月入五六百金。凡鸟为左翼作家，以戏剧名文艺界。秋尘在平津文艺界正负盛誉，出其余力，以编北画，于画报中，称雄华北。事业固皆不足以比大人先生之万一，顾回视恨水以一元数角，邀吾同党小嚼时，则小有进步，非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秋尘在北平大新闻系读书时，无大衣，于风雪中偕其夫人步行，穿过什刹海而上课，虽饶佳趣，其耐清苦可知。今之能砚田自活，非当年努力之结果乎？君方盛年，而其勤苦又不减往昔，前途当未可限量。君之未可限量，亦即北画之未可限量也。是亦读者所乐闻欤？恨水近有诗答宗子威诗丈曰：哭儿偏是忧时泪，卖赋终非报国才。又曰：糊口文章随俗好，白头岁月（恨水有少年白之病，三十以来，星星恒露矣）逼人来，唐颓可想。视老友事业文章，两两上进，自觉“今女画”矣。虽然，同学少年多不贱，亦人生一乐事也。

所望于旅行杂志

载《旅行杂志》，1936年第10卷第1期（署名：张恨水）

在宇宙间言之，万年犹等于一刹那，而在人生言之，则十年已最悠久之岁月。因吾人持事涉世，平均不过十年之五六倍耳。赵君豪先生，主持旅行杂志，今次已届十年，其持之以恒，殊令朝三暮四之文人，闻风兴起。去冬莅沪，先生谓将于一月出特大号，嘱愚预为一文。愚不才自知不能有所贡献，但为友谊故，谨勉述其感想焉。

愚读旅行杂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邮到，即置百事于不顾，忽忽展读一遍，以当卧游。而明窗净几，偶做遐思，亦辄于书架上抽取一卷读之，而解枯坐之苦闷，由是言之，可知旅行杂志，不仅为旅行家备之，正亦可为居家者备之。因居家者，旅行未得，可读此书以神驰宇内也。

职是之故，愚以为旅行之文，虽以描写山水胜景为尚，而各地人情风俗，殆亦不容忽略，尤其舟车价目物产品级，有介绍之必要。盖山川胜景，古人已先我言之，山犹是山，水犹是水，虽以各游历家各个眼光之不同，分别申其意以成文，然后人言之者，究无以大异于前人。若人情风俗，则古人游历之文，向所不取。即徐霞客洋洋巨著，亦仅以简练之文，记山谷形势而止。使能将其足迹所经，闻见所得，尽付篇章，则有助于后人经济文章者，宁可估计？故今人作游记之文，正可于泉石之外，另有所取材。如游四川兼叙其物产之富，游广西写其建设之速，游甘肃白其人民之苦，既可避免沉浮，而亦有益于社会国家。旅行杂志，不尽为供给游历家之读物，似可自兹以后，略略偏重于此。即专为供给游历家的读物，是项纪载，亦游历家所不厌弃也。至舟车价目，旅运宿食，虽为末节，而正为征人所欲知。言之不烦，亦颇感奇趣。

愚非游历家，言之或不尽当，姑以赵先生之嘱，为述其寸见如此。见哂大方，非所计矣。

**作者简介：朱周斌，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